



甘肃省藏学研究所 编
丹 曲 / 主编

འཕགས་པའི་རྒྱུ་རྐྱེན་

安多研究

第十二辑



甘肃民族出版社



འཛོམས་ཤིང་འཕུལ་

安多研究

第十二辑

甘肃省藏学研究所 编
丹 曲 / 主编



甘肃民族出版社

目 录

民 族 问 题

对促进我国民族关系和谐的几点思考 蒲文成 (001)

历 史

明代嘉靖朝四川龙州土司薛兆乾之乱研究 何金骑 (010)

试述诺那呼图克图在西南边疆建设中的作用 卢本扎西 (027)

纳藏信仰多元共生关系及木氏土司宗教策略

——纳、藏民族信仰关系历史与实证研究 郭志合 (032)

藏 传 佛 教

元代西藏的宁玛派 陈庆英 陈立健 (043)

甘加白石崖寺历史文化考述 扎 扎 (048)

河西走廊藏文化考察报告 华锐·东智 张吉会 (057)

龙树《十二门论》中之“立” 孙江龙 (064)

藏 族 教 育

论西藏佛教寺院教育现代化转型的意义和途径 徐东明 (071)

藏传佛教寺院的教育体制研究——以拉卜楞寺为例	于丽萍 (084)
浅谈甘南藏族地区的小学汉语教学	张利军 (089)

文献与目录

对明朝关于家族性寺院大崇教寺高僧勅封的梳理	张润平 (096)
重庆宝林博物馆藏敦煌藏文写经生考	勘措吉 (104)
李安宅边疆文化思想管窥：以《边疆社会工作》为中心	邹 敏 王 睿 (111)
黄明信藏文文献目录学研究述略	坚参才让 张博香 (118)
从县志所载寺院碑刻看明代甘肃安定的佛教变迁	仲彦玮 (125)

文化 艺术

略述土族《格萨尔》中的宗教思想	王国明 (134)
人类学视野中的天祝八道沟村“桌子神”祈福现象	赵仁钦措 (141)
夏河地区浪山节及其节日由来探讨	王 倩 (146)

现实问题

藏族文化的种类、特征及其作用	丹 曲 (150)
甘南藏区文化旅游发展条件及开发问题	杨才让塔 (172)
藏区特色文化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启示	窦存芳 张 勇 (179)
青藏高原特色畜牧业评价方法探析及应用研究	刘巍文 (186)

藏学著作翻译

衮本强巴林志略——遍显明镜

..... 却西·洛桑贝丹龙日加措 撰文 陈庆英 陈立华 王晓晶 译 (193)

Contents

National Problems

- The Thoughts on Promoting Our National Relationship to Harmony
..... *Pu wencheng* (001)

History

- The Study on Rebellion of Chieftain Xuezhaoqian in Longzhou Sichuan in Jiajing
of Ming Dynasty *He jinqi* (010)
- A research on the Nor-na lama's rol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Southwest frontier
..... *Klu vbum bkra-shis* (027)
- Multi-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Tibetan Buddhist and Naxi beliefs and the Mu-Tusi's
Religious Policy——An Case of Tibetan Buddhist and Naxi beliefs in History and
Empirical Research *Guo zhihe* (032)

Tibetan Buddhism

- The Nying-ma of Tibet in Yuan Dynasty *Chen Oingying/Chen lijian* (043)
- The Research on Historical Culture of White Stone Cliff Temple in Ganjia
..... *Zha zha* (048)

The Investigation Report on Tibetan Culture in Hexi Corridor

..... *Dpaw ris don vgrub/Zhang jihui* (057)

The set up in Nagarjuna's twelve door on *Sun jianglong* (064)

Tibetan Education

The Significance and Ways of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n Tibetan Buddhist Monasteries

Education *Xu dongming* (071)

The Study on The Education System of Tibetan Monastery——Illustrated by The

Case of Labrang Monastery *Yu liping* (084)

Chinese teaching in preliminary school in Gannan Tibetan autonomous region

..... *Zhang lijun* (089)

Literature and Contents

Ming Dynasty temple on familial worship religion temple monks Chifeng large comb

..... *Zhang runping* (096)

An essay study Tibetan Manuscripts keep in Chongqing Baolin museum

..... *Khams mtsho skyid* (104)

Humble Opinion about Li Anzhai's borderland culture Thought:Centered on

Borderland Social Work *Zou ming/Wang rui* (111)

A Literature Review of Huang Mingxin's Studies on Tibetan Bibliography

..... *Rgyan mtsan tshe ring/Zhang boxiang* (118)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in Gannan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An Analysis Based on County Annals *Zhong yanwei* (125)

Cultural and Art

The Tu ethnic minority “gesar” religious thought in the article

..... *Wang guoming* (134)

In the perspective of anthropology in Tianzhu County ba-daogou village “table

praying God” phenomenon	<i>Zhao rin chen vtsho</i>	(141)
A Study about the Langshan Festival and Its Origin in Xiahe Area	<i>Wang qian</i>	(146)

Realistic Problems

Categories,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of Tibetan Culture	<i>Dam chos</i>	(150)
The Development Problems and Development Conditions on Cultural Tourism in Tibetan of Gannan	<i>Yang tshe ring thar</i>	(172)
The 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on development and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industries in Tibetan areas	<i>Dou cunfang/Zhang yong</i>	(179)
Study on and application the evaluation method of the characteristic animal husbandry in Qinghai Tibet Plateau	<i>Liu weiwen</i>	(186)

Translations of Tibetan Works

A brief history of sku vbum byams pa gling	<i>Che shes blo bzang dpal ldan lung rigs rgya mtsho, Translated by Chen qingying/Chen lihua/Wang xiaojing</i>	(193)
--	--	-------

对促进我国民族关系和谐的几点思考

蒲文成

〔内容提要〕民族关系关乎国家的稳定和统一。促进民族关系和谐,全社会要进一步认识民族关系的重要性,高度重视民族宗教工作,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民族之间应相互尊重、信任、讲诚信,各民族都要认同伟大祖国和中华文化,树立中华民族意识;党和政府应进一步借鉴历史经验,讲究策略方法,根据需要可做必要的退让;要加强法制建设,切实依法治国,并处理好若干影响民族关系的其他问题。

〔关键词〕民族关系;促进和谐;若干思考

民族关系是民族国家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和具体国情相结合,探索、制定、执行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政策,致力于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确立,各族人民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合作、互相帮助,不断巩固和发展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绩不菲。应该说,我国现阶段的民族关系总体上协调,是我国历史上较好的时期之一。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进入新时期以来,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同民族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狭隘民族主义思潮在部分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中泛滥的问题,部分汉族人的大汉族主义思想问题,地方政府在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一些人民内部矛盾长期没有得到正确的认识和合理的解决,造成了部分地区民族矛盾的加剧”^①。部分地方甚至发生了涉及民族因素的群体事件,“维稳”成为令人头疼的头等大事,民族关系问题和分裂主义威胁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青海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的报告中指出:“青海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并存、多文化交融,集中了西部地区、民族地区、高原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所有困难和特点。建设新青海,创造新生活,就必须把统筹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把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宗教关系作为重要任务,”报告进一步强调“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和宗教关系,这是民族团结进步的核心要求”。为了促进我国新型民族关系更加和谐,笔者不揣浅陋,谈以下一些思考,并归纳为十个方面、二十个字,以便挈领。

一、重视

即进一步认识民族关系的重要性,重视民族宗教工作。民族关系是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联系和交往

^①杨圣敏:《要缓解矛盾 不要制造敌人——对处理当前民族关系的一点儿看法》,《中国民族报》,2013年3月15日第5版。

状态,它关系到社会的和谐和稳定,还因为少数民族多在边疆,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关系影响到国家边疆的安全和巩固。因此,对于民族关系,从古到今几乎所有有远见的政治家都予以高度重视,把处理好民族关系作为执政的重要内容。民族关系往往涉及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并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呈现出极其复杂性。特别是对于几乎全民族都信仰一种宗教的民族来说,宗教对民族意识和民族心理产生很大影响,如果对宗教问题处理不慎或不当,会引发民族之间的摩擦和冲突,激化民族矛盾,影响到民族关系,这在我国历史上和当今世界上有许多事例。因此,我们经常讲,民族问题和社会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能否重视和处理好民族关系,事关祖国的统一、边疆的巩固、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总是反复强调民族问题的重要性,一再提醒我们“民族、宗教无小事”,要积极稳妥地处理好民族关系,维护好民族团结的大局。然而,在现实中并非尽如人意,在任用、考量、培养干部中缺乏相关的硬指标;事关民族关系方面的许多工作主要靠统战和民族宗教工作部门,其他部门则在出现突发事件时去应急灭火;不少干部很少潜下心来学习民族宗教理论和政策,官僚主义严重,工作浮在表面,不能深入社会和群众,或作浮光掠影的“考察”,并不很了解群众的真实想法和疾苦;工作形式主义严重,图表面轰轰烈烈,不求实际效果,耗费人力、财力和时间,却不能有效解决实际问题。这一切都说明,我们在重视民族宗教工作方面尚有差距,难怪一些干部群众怀念和推崇 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的民族关系。

二、发展

发展是我国民族问题的关键。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经过多年发展,民族地区和全国一样,经济社会有了长足的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由于自然人文环境、社会发展基础等多种原因,目前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质量、总量以及协调性等与内地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发展滞后仍是我国民族问题的主要方面。这种发展差距表面上看是经济问题,但它直接制约民族自身的进步和利益的分配,影响到收入、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等一系列民生问题,影响到平等权利的行使和民族间事实上的平等,从而成为民族问题,影响到民族关系。因此,民族地区加快发展有助于民族平等和民族关系的和谐,为国家的长治久安从经济上奠定基础。目前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中,部分地区的群众对于资源的勘探和开发表现出一些抵触情绪,分析其原因,除了神山保护之类的认识问题外,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资源开发与当地群众的致富未能有机地结合起来,群众未能真正感受到资源开发的实际利益;二是对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竭泽而渔、吃子孙饭、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开发方式表现出无奈和反感。因此,应该借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的东风,认真思考如何将资源开发与周边群众增加收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紧密结合起来,强化生态保护理念,切实落实各种环保措施,真正建设生态文明。

三、尊重

构建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实现民族间的团结和谐,相互尊重是重要的基础,特别是在处理好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之间关系问题上,应坚决抵制和不断消除大汉族主义思想及其影响。我国各个民族在经济生活、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以及风俗习惯等方面都自成系统,有各自不同的人文特点,很难说孰优孰劣。然而自古以来,由于统治阶级的偏见,对各少数民族始终有一种偏见,在所谓正統的史书中多有污贬之词,如称少数民族为“夷狄”、“戎狄”、“蛮夷”、“胡尔”、“番子”、“鞑子”、“老回回”等等,甚至在

有的文献中直接用“贼”、“寇”、“鄙薄之徒”之类的字眼。早在春秋时期,有人就提出“戎狄豺狼”,要“刑以威四夷”^①。对此,带有鲜卑人血统、处理民族关系较好的一代明主唐太宗李世民曾承认“自古皆贵中华,贱戎、狄”^②。时至今日,人们说话著文虽不敢再用类似词语,但真正做到尊重还有待时日,至少在一些人群中还存在着民族歧视心理,特别是近年西藏、新疆的骚乱事件之后,这种心理有抬头的趋势。一些人不能严格区分一小撮坏人与多数人的区别,把反感少数人的做法扩展到对整个民族的看法,在内地发生机场安检、宾馆住宿、出国旅游组团等方面的歧视性做法,表现出鲜明的“民族色彩”,引起整个藏民族的反感,影响到汉藏民族关系。笔者曾与一些原本一心一意跟党走的老一代民族同志接触谈心,他们都感到痛心和不理解,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做法,值得认真反思。民族歧视心理的复活,除了不相信民族大多数,民族宗教理论知识贫乏,以及与一些政策设定有关外,更多的是由于对民族的不了解而造成不尊重。尊重一个民族,其基础是先要了解这个民族,了解它的历史、文化、信仰和传统,从中发现民族的个性和特点,以及许多值得敬重的优点。以藏族为例,藏族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勤劳、勇敢、诚信、善良,疾恶如仇、同情弱者,为青藏高原的文明做出了特有的贡献,如果在实际的交往中真正了解了该民族的这些品格和优点,从心底里尊重,民族关系不会不和谐。民族间的交往与人际交往具有相同性,你尊他一尺,他会敬你一丈,你若瞧不起他,他岂会成为你的朋友?我们应该永远记住,民族间的帮助固然重要,但对一个民族的不尊重(包括信仰、传统、文化、风俗等),是对这个民族最大的伤害,是影响民族关系最重要的因素,要格外注意。

四、互信

互信是民族之间相互信任,坦诚相见,以心换心,以真诚换真诚,不猜疑对方,这是民族关系良性发展的基础。在我国历史上,有一种根深蒂固、影响很坏的观念,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③。这一观念从春秋时提出后,历代多有引用,且有发展,如魏晋时期的江统阐述民族关系时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④。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历史上的汉族统治阶级往往猜疑少数民族,对少数民族不放心、信不过;而少数民族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猜疑、信不过汉族,对汉族心存戒备。由于相互不信任,就不能坦诚相见,以心换心,相互难有真诚;由于互不信任,就会互相猜疑,不能推心置腹,往往造成许多误解和心理创伤,甚至兄弟变仇敌,造成民族间的冲突和战争。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太多了,因而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简单地说,就是两个字,一个是战,一个是和”,“战争与和好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两大主题”^⑤。因而,中国共产党人把互信作为处理民族关系的一条基本原则,周恩来总理早在1957年就说过,民族间怀疑的心理增加了,“就容易助长民族分裂、不团结的倾向”^⑥,要求民族间要互相坦诚信任。然而民族间互不信任、猜忌的余毒流传至今,我们还不能说已经完全肃清。实事求是地讲,在一些或个别人的思想意识中,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相互猜疑不

①《左传》闵公元年、僖公二十五年。

②《资治通鉴》卷198,“贞观二十一年五月庚辰”条,第6247页。

③《左传》僖公十五年、《左传》成公四年。

④《晋书》卷56《江统传》,第1532页。

⑤崔明德:《对中国民族关系的十点认识》,《烟台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50页。

信任的情况,如不尽快克服,肯定会影响民族关系的和谐,影响民族团结的大局。近年藏区出现自焚事件后,一些部门以维护稳定为由,对出入藏区的藏族同志严格检查,甚至一些深入基层搞调查研究的同志反映工作多有不便,对他们的不信任感到遗憾,由此觉得待人不公,也对党的民族政策产生怀疑。这样,互不信任的思想虽然嘴上不讲,内心深处却在滋长。因此,我们当下有针对性地强调民族间互信的原则,很有现实意义。

五、诚信

诚信包括“诚”和“信”两个方面的内容。“诚”即真实诚恳、没有虚假,“信”即诚实无欺、言而有信。诚信属于道德范畴,是衡量一个人品德的重要标准之一,古有“人无信不立”的说法,倡导君子做人处事应“谨而信”,与人交往一定要讲诚信,不欺骗人。民族之间的交往也完全一样,如果失去诚信,则难有和谐的民族关系。有人研究唐朝的民族关系后指出,唐太宗即位后,常与大臣讨论诚信问题,曾明确宣布“吾以诚信御天下,欲使臣民皆无欺”^①。他将诚信推广及广德、安边,“德泽四海,德洽四夷”,用来处理民族关系,使诚信更具有政治意义。因而,在贞观年间出现“四夷如一家”的大一统局面,“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②。与之相反,武则天执政期间,“民族关系十分糟糕。东北的契丹,经常骚扰唐朝;北方的突厥和回纥,不时起兵反唐;西南的吐蕃也兴风作浪。究其原因,我们可以归纳出很多条,但最关键的在于武则天的失信”^③。笔者以为,如果说我们的民族关系还有不够和谐的地方,可能与以往一些政策的执行有关,或是多种因素的聚合和积累。我们应以历史为镜,作一些回顾和反思很有必要,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检查诚信方面的问题和不足,以改进工作,倡导民族间的诚信,以促进民族关系的和谐,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六、认同

民族国家的认同关系到民族关系的和谐和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许多研究成果表明,民族融合是一种历史趋势,始终伴随着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我国历史上,有过 160 多个古代民族(或部族),经过长期演进融合,现在是 56 个民族。各民族具有明显的同源性,拿人数最多的汉族来说,其实是历史上诸多民族的融合体,是华夏民族集合的后代,皮肤纹理有很强的民族杂合性,汉族并“没有血缘意义上的联系,只是过去对中原地区生活的人群的一个总称”^④。汉藏的血缘同源已被基因鉴定证实,而语音学又侧面证实了汉藏语言同根,随着文化历史研究的深入,龙图腾的文化符号对于汉藏民族以及其他先民有龙文化的民族来说,还有更久远文化图腾符号的同源性。同样,各少数民族在繁衍发展中,也一步步与汉族和别的民族相融合,间杂有其他民族的文化元素。因此,在我国没有纯而又纯的汉族,也没有纯而又纯的其他民族。再说所谓的“中国”,并不都是汉族人建立的,秦王朝曾被视为“戎狄”,隋唐王朝由鲜卑化的汉人建立,元朝和清朝更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必须指出:“我们在看待中国历史时,不能把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中原王朝等同于中国,把中原王朝与其他各民族建立的地方性政权对立起来,忽略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事实。否则,就不可理解以蒙古族为统治主体的

①司马光:《资治通鉴》卷 192,“武德九年十二月”条,第 6027 页。

②宋祁、欧阳修等编著:《旧唐书》卷 71《魏徵传》,第 2558 页。

③崔明德:《对中国民族关系的十点认识》,《烟台大学学报》,2013 年第 3 期。

④周怀宗:《今天已没有纯种汉族人》,《北京晨报》,2010 年 2 月 18 日。

元朝,乃至以满族为王室的清朝都是中国的王朝。”^①事实证明,中国社会的特点不是以族群为认同的社会,而是以文化为认同的社会,是多元一体,有很大的包容性。中华民族的这种多元一体,是各民族共融在中华民族这个社会母体之中,这个母体中又存在着各民族文化的差异,形成一体内的多元。所谓中华文明,是我国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共同创造的,在历史的长河中,各民族共同奋斗,创建了祖国大家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近代在与列强的对抗中,各民族共同抵御外敌侵略,捍卫祖国统一,虽然形成自觉的民族实体,但各民族却有着真正丰厚的历史基础、文化共识和共同的历史命运,真正“四海之内皆兄弟”。新中国建立后,民族间的交流更加增强,随着社会生活条件的一体化,民族的融合进一步加剧,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各民族共生共存,共同的文化因素和利益的共同性、一致性不断增多,在共同奋斗中进一步增进了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认同。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家始终给予了高度关注,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特别是在抗击一系列重大自然灾害中,举全国之力,人们感受到国家的力量,深切体会到各民族精诚团结、互相支援的重要性。然而,近代欧洲的民族概念被引进后,虽然有利于民族自觉的意识,却使民族意识不断强化,成为民族分裂思潮的基础,阻碍民族间的正常交往和民族融合,并成为国外敌对势力干涉我国内政的借口。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讲,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在落实民族政策的过程中,强调族群的“自我认同”,而忽视了“中华民族”认同意识的培养与巩固;我国的一些制度化的优惠政策虽然可以缓解族群间的隔阂和矛盾,但强化了族群政治意识,一旦国内外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有可能转变为“民族主义”运动。因此,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特别提出了四个认同,即“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一些智者也呼吁,在国民教育体系和社会教育中,应该大力渗透“国家认同”的理念,培育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自豪感。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必须全面贯彻执行,但自治地方是国家行政区域的一部分,不具有主权国家的权利,不能从国家分离出去,这是一个重要原则。

七、借鉴

我国历史上,许多政治家非常注意处理民族关系,留下了不少处理民族关系的政治智慧和成功经验,如诸葛亮七擒孟获,使孟获心悦诚服,所部少数民族诚信归顺,从而蜀国南方稳定,保证了北伐(诸葛亮、姜维北伐未果,是由于其他原因,绝非民族关系问题拖了后腿);唐太宗李世民一生关心民族关系,虚心纳谏,重用少数民族精英,积极推行和亲政策,真心相待民族首领,赢得了少数民族的真心拥戴;清王朝为了稳定西陲,册封达赖、班禅等大喇嘛,不惜耗费大量人力财力,修建北京黄寺、承德外八庙等,较成功地实施了民族宗教统战政策。历史上好多思想家对民族关系提出过自己的理论见解,形成了许多有关民族关系的思想,其中虽然有糟粕,但也有精华,可供今天借鉴。如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孔子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②,意思是说,边远的人不归服就修文德来招徕他们,既招来了就安定他们。他还提出了“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③的原则,认为对少数民族既要进行教化,又应尊重其历史和风俗。两汉时期,许多政治家、思想家“继承和发展春秋以

^①蒲文成、王心岳:《汉藏民族关系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8页。

^②《论语·季氏第十六》。

^③《礼记·王制》。

来的大一统思想,将蛮夷戎狄视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①。隋唐时期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已经成熟,有以隋文帝为代表的“威服德怀”理论,唐太宗为代表的“爱之如一”及“诚信”理论,陈子昂为代表的“以夷制夷”理论,还有“推布诚信”、“天下一家”、“绥柔荒远”等等。宋元明清时期,传统的民族关系思想进一步完善和丰富,更明确地提出“四海为家”、“华夷本一家”,认为“君主华夷,抚御之道,远迩无间”,应“一视同仁”、“示信以怀远方”。总之,从古到今有见地的观点、思想、做法颇多,现有不少研究成果,值得今天决策和工作参考。

八、策略

处理好民族关系,讲究策略也很重要。历史上常见的策略有召见、册封、会盟、羁縻、和亲、持节抚慰、互市贸易等等,当然也有派兵平乱、武力征讨等军事办法。新中国建立后,由于社会所有制关系、政权性质等的变化,我国民族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成功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将它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根据民族平等的根本原则,在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下,各聚居少数民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以聚居区为基础,建立自治地方,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少数民族当家做主,管理本地区本民族内部事务。1951年2月5日,制定出《民族区域自治试行通则》,第二年2月22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规定更为全面。1954年的宪法有九条是民族问题的内容。1984年颁布《民族区域自治法》,为有关法律规定提供了基本原则。2005年5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重申:“民族区域自治是我们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必须长期坚持和不断完善”,“必须全面贯彻执行”。这一制度实施多年,国家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以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已经建立。但值得关注的是,民族自治法的贯彻执行还不能说尽如人意;在从事民族工作或处理一些民族宗教问题时,还存在着方法不当或不够慎重的问题等。以藏族地区为例,1958—1959年的平叛扩大化,“文革”中宗教和传统文化遭到严重破坏,近年来部分学校轻视藏语文的教学,有些地方本地人的考学、报考公务员的指标被外地人挤占,在市场化过程中民族企业的纷纷倒闭,当地矿产资源的随意开发和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以反渗透为名无限上纲上线,无视传统强迫僧人批判其上师,形式化的寺院教育活动,试图以武力维护稳定等等。这一系列问题,有些(如“文革”中发生的)是全国性的,需正确认识;有些既有认识上的问题,也有策略方法上的问题,很值得研究和总结,应继续破除“左”的思想影响,取得经验教训,认识并解决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将有助于减轻维稳方面的工作负担,缩小行政开支,实现民族之间的真正和谐和社会稳定。

九、退让

退让,即用让步、妥协和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法解决民族之间的矛盾纠纷,避免争执升级,它也是协调民族关系的办法之一。在我国古代历史上,许多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在处理民族关系时,不唯靠武力征伐,而多主张退让妥协,避免战争,如“和亲”这种政治联姻活动本身就是一种退让。烟台大学崔

^①崔明德、马晓丽:《隋唐民族关系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页。

明德先生多年研究我国古代民族关系史,成果颇丰,有相当影响。他曾提出“妥协是处理民族关系的一种智慧”的观点,以许多历史事实作论据,有较强的说服力^①,笔者同意他的看法。旧时,一些民族地区,部落之间发生纠纷,常有宗教上层人物利用自己的影响和群众的信仰,出面调停说和,从而化干戈为玉帛,用的也是劝和退让的办法。明朝万历年间,西藏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来青海活动期间,凭借自己的宗教地位和群众的虔诚信仰,多次调解各民族之间、同一民族内部部落之间、明朝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和纠纷,对安定社会、促进民族团结起过积极作用。特别是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河套蒙古首领俺达汗从今内蒙古拥众入据青海湖地区后,累犯庄、凉、西宁等地,剽掠牲畜,妨碍农桑,加害行旅,对明朝造成威胁。明朝感到头疼,又无办法之际,“听说俺达汗对索南嘉措非常尊重,言听计从,乃于1578年(明神宗万历六年)命甘肃巡抚侯东莱差人到青海请索南嘉措到甘肃与他会晤,并嘱索南嘉措劝说俺达汗率众回内蒙古”^②。三世达赖喇嘛亲往甘州(今甘肃张掖),制止了攻入长城以南汉人区的察哈尔王族(土默特等部)万余人众,汉人也做出让步“拿出财物使蒙古人满足,蒙古人遂回到自己牧地,汉人从恐惧中解脱”^③。事成后,三世达赖去信明朝宰辅张居正,信称他已吩咐顺义王(俺达汗)回去。第二年,俺达汗返回土默特本土,达赖喇嘛按照明朝皇帝的意图,办了一件明朝皇帝办不到的好事。如果明王朝不用退让和平的办法而诉诸武力,则会付出很多人力财力,结果不一定理想。类似的例子历史上太多了,在当今世界也有许多以妥协方式处理矛盾和民族关系的事例。因此,在一些民族关系问题的处理上,退让乃至妥协,是一种智慧,是一种境界和气度。古语说,退一步海阔天空,讲的是人应该宽容大度,不计小的得失,不为一些事争得头破血流。我国各民族之间是兄弟关系,兄弟之间并无根本的利害冲突,理应相互包容、谦让。反思我们以往的一些工作,往往把必要的退让和妥协当做软弱、不讲原则、意志不坚定的表现,宁可付出巨大的代价,也决不示弱退让,缺乏必要的政治智慧,值得深思总结。对于一些已经定型的做法,也可以在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大多数群众愿望的基础上,适当做一些退让性的调整。只要调整后群众满意,政府省心省力,何乐而不为!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作保障,何惧之有!

十、法治

法治还是人治,是衡量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促进民族关系和谐需要法律的完备和严格的执行遵守作保障。影响民族关系和谐的因素很多,有来自人民内部的认识因素,也有来自敌对势力的干扰和破坏。前者需要持续性地开展社会主义法制宣传教育,通过“七进”等活动,组织干部群众深入学习宪法、刑法、反分裂国家法、民族区域自治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宗教事务条例等法律法规,掌握基本的法律法规知识,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律意识,崇尚法治、遵纪守法,自觉维护民族关系。对后者必须依法严厉打击,维护法律尊严,不能失之太软,否则就是一种变相的纵容。这里,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注意,要处理好:

(一)对民族意识的认识问题

民族意识是一种客观存在,有民族就有民族意识。在一个多民族共处的环境中,每一个民族都会

^①牙含章:《达赖喇嘛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2页。

^②牙含章:《达赖喇嘛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2页。

^③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三世达赖喇嘛传》,塔尔寺藏文木刻本,第97页。

表现出一定的民族意识。不能简单地把特定民族的民族意识视为消极甚至等同于分裂意识,人为地去加以消除,否则容易引发民族的对立情绪;同时也不能让任何的民族意识超越国家意识和中华民族意识,这样不利于民族团结,甚至会成为分裂主义的思想温床。在我国,各民族共同奋斗,创建了祖国大家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捍卫祖国统一,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各民族利益有共同性、一致性,在共同奋斗中增进了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认同,人们对过激的强烈的民族意识越来越反感。如果有人利用民族意识来破坏民族关系、分裂祖国,一定要用法律的手段严厉打击。

(二)对民族主义的认识

民族主义是学界争议的一个课题。它是一把双刃剑,积极健康的民族主义可以振兴一个民族,推动历史变迁。在我国近现代史上,民族主义曾是中国革命中民心思变的一个基础,我们依靠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搬走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获得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但现阶段民族主义的内涵在发生变化,狭隘民族主义也称“地方民族主义”,是一种以孤立、保守、排外为特征的民族主义^①。其主要表现是夸大本民族在历史活动中的地位,否定一国中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强调本民族的利益到不适当的地步,拒绝吸收其他民族的先进思想文化。它有害于国家意识,也不利本民族的发展,是一种限制视野、拒绝吸收的观念,其结果画地为牢、作茧自缚,还很容易被民族分裂势力所利用。同时,大汉族主义也是一种狭隘的民族意识,认为对少数民族的帮助是施恩,有人把少数人闹事与整个民族相混同,或不能理解因宗教感情引起的一些事端,视宗教问题是政治问题,随意上纲说成是搞独立,甚至说一些缺乏国家意识的言论,不利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不管是哪个民族,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消极、病态的民族主义会演变为民族分离主义,将葬送一个民族。“民族分离主义是集聚和生活在特定地域上的满足将其政治诉求与脱离现有政治共同体相联系的一种民族主义的特殊形式。”^②它在国内少数干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中有一定影响,极具隐蔽性,是社会潜藏的不稳定因素,非常有害于民族团结和民族关系,甚至影响到国家的统一。因此,在国际民族分离主义在全球泛滥的当下,我们不能无原则地强调民族主义,应当把坚持和发展有利于民族进步和人类进步的民族主义作为民族精神建设,必须强化中华民族的国族意识,反对狭隘的民族意识,并通过强化公民意识来淡化民族差异性以构建现代国家认同。对于民族分离主义则要严厉打击,绝不能手软。

(三)民族关系与民族宗教问题相纠结的问题

我国许多民族具有宗教信仰,在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民族问题往往与宗教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就要求我们要促进民族关系和谐,必须处理好民族与宗教问题,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民族与宗教往往相纠结,境外分裂势力往往打着宗教和民族的旗号,以民族文化遭到“侵略”和民族宗教受到“压迫”为借口,把宗教问题民族化、政治化、扩大化和暴力化,利用广大群众对于宗教的信仰来达到其政治目的。但我们的媒体总是按民族问题画线,乃至影响到对一个民族的严格控制,发生歧视性做法,引起该民族的反感,影响到民族关系,这种危险的行为值得认真反思。

^①樊红艳:《正确开展对青年学生的民族精神教育,防止滋生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人力资源管理:学术版》,2009年第2期。

^②王健娥:《民族分离主义的解读与治理》,《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

(四)近年法制教育的实效性问题

近年民族地区的法制教育工作投入大、时间长、全覆盖、制度化、长效化,但有效性值得研究。教育规模上实施人海战术,但实际效果总是事倍功半,僧尼反映“上面讲完了,我们却什么都没听懂”,收效不大;法制教育、社会控制投入的人力、财力、物力、精力多,社会局面是控制了,但不等于稳住了民心,群众心里真正想什么,我们并不真正掌握;教育的途径和方法单一,长期陷入教育材料、法律法规等入了寺院,但却难入脑入心的困局,相反引起群众的反感。诸如此类,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

作者简介: 蒲文成(1942—),原青海省政协副主席,研究方向为藏族史、藏传佛教、民族宗教理论和问题。

明代嘉靖朝四川龙州土司薛兆乾之乱研究

何金骑

[内容提要]发生于明代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的薛兆乾之乱是龙州外委土司集团政治生命的转折点。此次动乱因该土司集团中薛、李二土司内斗而起,进而发展成为威胁明王朝西南边疆要地松潘粮道的军事反叛行动。但明王朝对待此次土司内斗的态度却明显异于其一贯的宽贷统治策略,且在平定此次叛乱之后即着手进行改土归流,由此掀开了龙州地区历史上新的一页。

[关键词] 明代;嘉靖年间;薛兆乾;叛乱;龙州土司

一般认为土司制度正式形成于元代,发展于明代,完善成熟于清代,并在清代盛极而衰,最终在新中国民主改革以后消失。土司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长,地域广泛,且涉及民族众多,而其作为中国古代十分重要的地方行政制度和民族政策,对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各民族的交流融合,维护地方与中央之间合理的稳定关系以及保障边疆安全和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均做出了巨大贡献,发挥了积极作用,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

学界对于土司问题的相关研究,起源较早,自20世纪初至今已走过百年历程,对涉及土司的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文化及重大事件、人物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对不同地区、不同族别的土司以及改土归流等问题的研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和骄人成绩^①。

而相对来说,龙州土司的研究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引起关注。其中,曾维益先生算是先行者,其《平武土司述略》^②一文对龙州土司集团的起源和形成、土司世系、改土归流、特点与分期等问题都做了十分有益的论述。而后,曾穷石等学者^③也对龙州土司进行了关注和发掘,有着十分翔实的

①成臻铭先生曾统计,1908—2001年,94年中共在期刊上发表论文及出版论著300篇(部),平均每年3篇左右;2002—2006年,5年时间在期刊上发表论文200余篇,平均每年40余篇。李良品先生统计,2007—2010年内发表各类文章728篇,在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13篇,平均每年50余篇。成果之丰富,由此可见一斑。李良品:《中国土司研究百年学术史回顾》,《贵州民族研究》,2011年第4期,第115页。

②曾维益:《平武土司述略》,《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2期。

③曾穷石:《汉藏边缘的土司政治:13—16世纪龙州地方与中央的互动》,以13—16世纪龙州土司为研究对象,对集权的中央政权之下,处于官僚统治级序之外的龙州土司在汉藏边缘的统治展开分析和讨论,并提出要将“土司政治”与一般“土司制度”作概念上的区别(四川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贾雪峰:《藏区土司制度研究》,在余论部分以四川龙州土司为例,对藏区土司制度独特的个体化和复杂多样的地域化形态进行了探究(兰州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5月);贾雪峰、张科:《明王朝对藏区控制研究:以四川龙州土司集团为例》,则从社会控制角度切入,进行典例研究,认为处于汉藏边缘的龙州土司集团是中央王朝成功治理土司的一个典型范式(《青海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